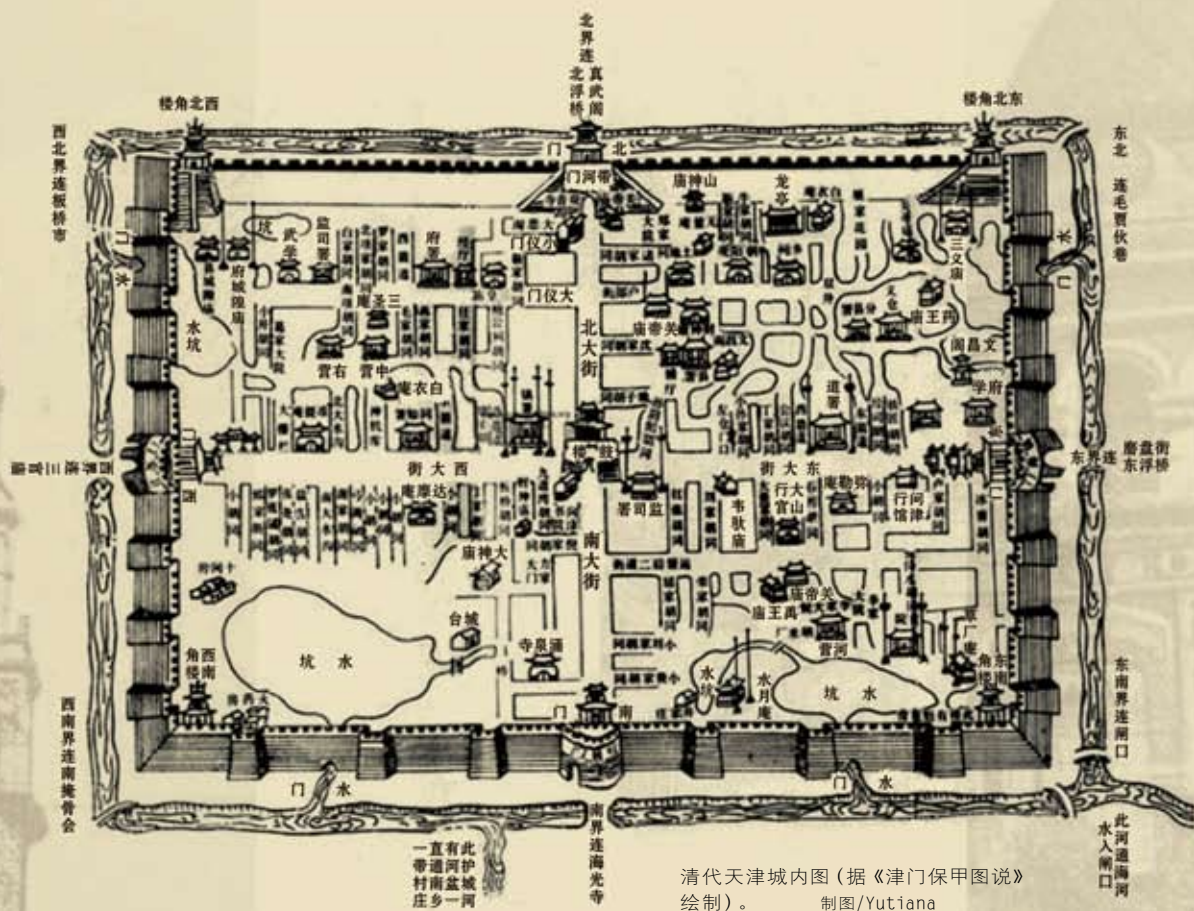


海河：孕育天津的摇篮

|文/靳怀埏| 编辑/田宗伟|



距今5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的蔚蓝色；4000年以后，先是有些许陆地冒出头，后来像听到集结号似的，陆地的面积越积越大；2500年后，这里升起了袅袅炊烟；1404年后，这里有一座兼有拱卫京师和保护漕运的城池拔地而起，并以“京南花月无双地”享誉四方；1860年后，这里成了西方殖民者淘金的乐园，一座现代的工商业都市横空出世，并在北中国独领风骚百余年……

她的名字叫天津。天津从一个小渔村拔地而起，最终崛起为中国著名的特大都市，是海河及与之相接的海洋孕育和滋养了她，并给了她文明基因与蓬勃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退海之地到直沽寨、海津镇

全新世的海退，加之黄河、永定河、滹沱河、漳河等大小河流的帮忙——它们挟裹的大量泥沙不断沉积，逐渐淤高了大片的洼地，天津平原逐渐浮出了海面。

婴儿状态的天津平原，地势低洼，遍地都是泻湖和沼泽，尚是人类望而却步的畏途。不过，生命力顽强的动植物捷足先登，成了这里的主人。考古告诉我们，距今3700多年的夏商时代，这里已是麋鹿的乐园。到了战国时期，除了今塘沽、汉沽一带尚在茫茫大海中等待破水而出外，其他地区均已成陆。随之，人类的脚步开始踏上了这片被后世称为“直沽”“天津”的年轻热土。

秦代，散布于今天津周边的聚落，西北部隶属于泉州县，西南部则属于东平舒县。到了西汉中后期，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海侵，“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水所渐矣”（《汉书·沟洫志》）。海进人退，涛声震耳。

东汉末年，在曹操的全力经营下，通过开挖人工运河连通了海河平原大部分水道，初步形成了海河水系。之后，随着大海的节节退却，沉沦的陆地又重新冒出头来，海河两岸又升起了袅袅炊烟，回荡着鸡鸣犬吠。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陷入了少数民族混战的局面。天津及周围平原地区先后为后赵、前燕的地盘。在

现今的东丽区军粮城一带，先后筑起了漂榆邑和角飞城，是为海运港口，从事运粮的水手、搬运工以及傍海煮盐、打鱼的人们纷纷在这一带聚居生息。

隋代永济渠开通后，成为北方与中原联接的大动脉。只不过那时的永济渠尚未光顾今天津市区，而是在今天津南的静海县独流镇折向西，穿过冀中洼地，经霸州信安北上涿郡（治今北京西南）。彼时，尚处于斥卤之地的天津仍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甚至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

唐代，天津东部出现了“三会海口”的地名。据考证，所谓“三会海口”，即派河尾——清河、滹沱河与沽河三水汇流入海的地方，具体位置在今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一带。由于当时天津北部的范阳（治今北京）、渔阳（治今天津蓟县）等地为边防重镇，驻军很多，粮饷需要从江南浮海供给，正所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杜甫《昔游》）。而“三会海口”的刘家台（军粮城）正是“吴门粟帛”转运的港口。当是时，从军粮城到北部边防的漕粮转运，主要分两路，一路溯潞河（北运河前身）至范阳，一路溯鲍丘水（蓟运河前身）至渔阳。于是，作为天津地区最早的海港——军粮城一带出现了“云帆转辽海（今渤海），梗稻来东吴”（杜甫《后出塞》）的景象，军粮城也以唐代海港名镇载入史册。

北宋时，天津地区成为宋辽（契丹）的交界之地，双方以白沟河（下游即今海河）为界。为了阻止契丹铁骑的南下，北宋在界河上苦心经营，潞水为塘泊防线。塘泊防线的东端，大体处在今天津以南、沧州以北的地区，系由破船淀、蒲淀、灰淀、方淀

四个塘泊组成，西与白洋淀相接。界河下游南部属乾宁军和沧州的清池县（后称清州、青县），北部属辽幽都府（后改为析津府）武清县。

出于防御的需要，北宋朝廷在塘泊防线（界河右岸）的“险厄处”设置了一系列“寨”、“铺”等军事据点。

其中清池县有乾符、巷姑、三女、泥沽、小南河五寨，乾宁军有钓台、独流北、当城、沙涡、百万涡六寨。寨设“寨官”，不但带兵，还兼管民事诉讼。这些寨大多位于今天津静海境内，泥沽、双港、小南河、当城、三女、沙窝、独流等寨名一直沿用至今。

女真族灭辽逐宋，建立起大金王朝，占据淮河以北的半壁江山。天德五年（1153年），金朝将都城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为了保障都城庞大的粮食物资供应，金廷重新修浚淮河以北的运河，恢复漕运。泰和五年（1205年），金章宗完颜璟至霸州（今河北霸县）巡视漕运水道，发现穿越冀中洼地的永济渠旧道已淤塞不通，“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新凿运道从独流（今静海独流）北行，东折至柳口（今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直沽三叉（岔）河口（今天津市区狮子林桥一带），再北溯筇沟（潞水，今北运河），经通州至中都。与此同时，由于直沽一带滨海“多产盐”，制盐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随着直沽成了漕运枢纽和产盐基地，这里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为了保证漕、盐储运的安全，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前后，设立直沽



1949年的海河天津市区段。 供图/吕小南



天津海河老三岔河口。 供图/吕小南



1992年3月，天津塘沽港俯瞰。

摄影/胡维标/CTPphotoF0T0E



天津河流与城市的交响。

摄影/于嘉诚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俯瞰。

摄影/胡晓春/FOTOE

寨（寨址一说在旧三岔河口一带，一说在今大直沽一带），命完颜佐为都统“戍守直沽”。从此，天津有了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称谓——直沽。

元朝统一中国后，仍以北京为都（称大都），军需民食，“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廷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裁弯取直，开通了京杭运河，但因北段运河水源和河道浅涩等问题没有解决好，“运输难，糜费重”，除元初大都运粮由运河、陆路、海道组成的运输网接运外，后来主要漕行海运。海运的起点是太仓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济河镇），过胶东半岛至大沽口进入直沽河（今海河），并以东岸的大直沽为北洋漕运的终点港和海、河漕运中转站，再溯潞河（今北运河）而上运至大都。因潞河河道窄浅，大的海

船不能直接进入，需改换成船身较小的平底驳船，所以有“海运粮至直沽”之说。这时，“大直沽”的地名伴着漕运赫然出现了。

大直沽的地名最早出现在《元史·食货志》中：太宗丙申（1236年），“初于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盐煎办，每引有工本钱”。明正德年间编纂的《天津卫志》则记述道：

“元统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官观，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去今城东十里。”当时梯海而来的漕粮，每年“以数百万石计”，大德三年（1299年），达300万石。这些运载漕粮的船只，都要在大直沽交卸和转运，元政府在大直沽设置了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每次接运工作，要持续两个月左右。与此同时，

随着漕船而来的还有商船，运来了南方的特产和物资，“东吴转海输杭稻，一夕潮来集万船”，“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罍越布满街衢”。大量人流、物流的涌入，带动了大直沽一带的商业繁荣，百业兴旺。一时间，大直沽舟车云集，商旅驻足，百货盈衢，熙熙攘攘，成了南北粮食货物交流中心和集散地。因为大直沽在天津设卫建城前是直沽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独领风骚近百年，故有“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的说法。

当然，元代的小直沽的繁华虽然逊于大直沽，但也并不冷清寂寞。由于三岔河口（小直沽）是漕船北上京师的必由之路，因而有“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景象；加之这里又是产盐之地，有高松、谢实等18户人家在此设灶煮盐，因而此地肯定少不了人气和热闹。

由于直沽既是漕运枢纽，又是产盐重地，为了加强对直沽的戍守，延祐三年（1316年），在这里设立了海津镇（军事建制），派重兵把守。关于海津镇的地点，一般认为在今天津河东区大直沽。相传，在大直沽今河东六号路与海河交汇的地方，旧有“海津渡”，海津镇就建立在渡口附近。

“算盘城”的诞生

真正让天津发生质变，由聚落、军事寨（镇）而成为完整意义的都市的是明清时期，而作为这一转折的重要标识是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1406年）间的设卫筑城。

永乐二年十一月乙未（1404年12月23日），是天津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明成

祖朱棣下令在直沽设卫筑城，“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都指挥佥事凌云、指挥同知黄纲筑城浚池”（《天津卫志》），天津城市史自此肇始。

根据明代兵制，“卫”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一级军事建制。天津卫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保护漕运和拱卫京师。据大明《一统志》记载：

“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俱在静海县小直沽。永乐二年筑城，三年调天津卫并天津左卫，四年复调天津右卫以守备。”就是说，卫城筑成后，天津卫和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于1405年、1406年先后设立，三卫的指挥机关皆设在城中。

卫城的位置，在三岔河口西南，东距直沽河（海河）二百二十步，北距卫河（南运河）二百步。城垣初为土筑，周长九里十三，高三丈五尺，开设四个城门。城的形状是东西长、南北短，很像一把算盘，故俗称算盘城。永乐二十年（1422年），都指挥史陈瑄在土墙外用砖包砌。到了明弘治四年（1491年），城垣严重坍塌，天津按察副史刘福筹资重修城垣，用砖包砌城垣，同时重修四门城楼并筑瓮城，分别命名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其中以北门城楼最为壮观。

所谓“三卫”，即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按编制，一卫5600人，三卫应有官兵16800人。除了正军的军士外，还有与正军数量相当的余丁承担辅助性的服务工作。当时规定，官兵眷属可以随军居住。由此可知，加上余丁和军人的眷属，最初天津三卫的军户人口不下八九万。不过，由于天津三卫的管辖范围，东起渤海，南至山东德州，所辖各地特别是卫河（南运河）沿线要派兵驻

防，故实际在天津卫城内外居住的军户人口大约在三四万左右。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占据了压倒性优势，遂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津方言岛”，范围仅限于今天津市内六区和西青区的大部分、东丽区的小部分。

“天津方言岛”的东、南、西三面被静海音系所包围，北面则被北京语系所包围。

朱棣称帝以后，虽名义上仍以南京为都，以北京为行住，但事实上的首都已是北京。永乐十三年（1415年），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半天下之财赋，系由此路而进”。当时，大运河上漕粮万艘，每年通过天津运输的粮食达四五百万石；与此同时，天津还是漕粮储存的重要基地，曾有露囤千所，乃至在天津北郊的潞河（北运河）之畔建起了百万仓。特别是明廷为了贴补漕丁水手，准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的土特产品，这些货物有不少在天津发卖和转输。与此同时，各地的商船也沿南、北运河及海河上游其他水道下卫来津。于是乎，处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天津三岔河口一带成为漕粮的转运码头和商品物资的集散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天下粮艘、商船鱼贯而进，殆无虚日”（明《天津三卫志·跋》）。

漕舟、商船的汇集津门，必然会带动运输业、商业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军事城堡的天津卫突破军事性、封闭的“城”的限制，向综合性、多功能、开放的“市”发展。

果然，集市贸易随之兴起，先是在城的中心鼓楼和四门之内，开辟了宝泉、仁厚、货泉、富有、大道五集。接着，又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于

东、北、西门外和张官屯、天后宫前新设置了通济、丰乐、恒足、永乐、宫前一集和安西一市。城内外各集每旬一次，十个集轮过来正好一天一个，于是就有了“天津卫天天赶大集”之说。与之相伴的，是距三岔河口不远的东门和北门外若干商业区的形成，是商铺、饭馆、旅店等服务行业的应运而生，是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

助力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除了漕运外，还有“鱼盐之利”——“津邑，滨海区也。鱼利与盐同，捕鱼不下三十种”（《天津县志》）。尤其是盐业，可称津门的支柱产业。濒海的天津，盐业资源得天独厚，向来为产盐的基地。早在元代，就在渤海湾西岸遍设22处盐场，其中有津南，有咸水沽的兴国、富民二场，葛沽的丰财场；市区三岔沽场。到了明代，由于晒盐法的发明，盐的产量大增。天津一带所产的盐，称长芦盐，由于品质好，向来被视为贡盐中的上品，有“芦台玉砂”之誉。水陆交通的发达，还使天津成了长芦盐的运销中心，长芦都盐运使司青州分司、直沽批检所和盐运都司先后移驻天津。明末，长芦盐运销量已达约24万引（每引650斤），并涌现出一批家资万贯的大盐商。

在漕运和盐业的双轮驱动下，到了明清之际，天津终于冲破了单纯军事要冲——“卫”的地位，成为“镇城百货交集”的要埠。

所以，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使节赴京路过天津时，为这里“人烟稠密，交易频繁”而惊奇，把天津与广州、镇江视为中国三大港口。康熙十四年（1675年）天津道薛

柱斗编修的《天津卫志·序》用浓墨重彩对其赞誉有加：“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咸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为卫，实则一大都会莫能过也”。

清初天津仍为军卫，顺治九年（1652年）将左、右卫并入天津卫，三卫合一。康熙四年（1665年）将河西务的钞关衙门从河西务迁至天津，划归天津道管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大开，各地商旅纷纷放舟北洋，商船经大沽口驶入海河直抵天津，使天津商业更加繁荣，“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经济社会地位日益攀升的天津，呼唤着突破原有军卫建制新时代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了。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同年九月又升天津州为直隶州（清代规定，有下辖县而不隶属于府而归布政使司直管的州，称为直隶州），辖武清、青县、静海三县；雍正九年（1731年），又升州为府，附廓置天津县，形成了天津府管辖武清、青县、静海、沧州、南皮、盐山、庆云等一州六县的格局，从而实现了由卫到州再到府的“三级跳”。

经过康乾盛世的大发展，到了嘉庆初年，天津的繁盛又达到新的高度：“嗶嘤喧哗，洋船咸聚”，“瑰货方至，朱绿相毕，蟠螭、玳瑁、绮、贝、绣、螺之属，交贸互易，虽博望陈西域之富，平子论蜀都之饶，不是过也”（吴锡麟《南归记》）。鸦片战争以前，欧洲各国的舶来品也梯海而来，进入了天津市场。对此，天津诗人崔旭的《竹枝词》对东门外的洋

货街有这样的描绘：“百宝都从海舶来，玻璃大门比门排。荷兰琐伏西洋锦，怪怪奇奇洋货街。”

当时，除了早先就繁荣的东门外的宫南、宫北大街繁盛依旧外，北大关附近的河北大街、估衣街、针市街、侯家后一带，百货、商贾云集，饭馆、店铺林立，成为新的繁华中心。随着商业的发展，金融业也兴旺起来，尤其是宫南、宫北大街遍布钱铺、钱局、票号，成为钱来钱往的金融中心。

盐业作为天津的传统产业，在清代也有了长足发展。

由于清政府对长芦盐的生产和销售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引得了当地和外地富户纷纷投资盐业，一批家资万贯的盐商迅速崛起。道光、咸丰年间，天津出现了富甲一方的“津门八大家”，其中盐商四家，分别是益德裕高家、益照临张家、长源杨家、振德黄家；另外四家则是靠经营粮食和活动发家的，分别是天成号韩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

另据陈卫民等学者研究，到了清代中期，天津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城厢地区居民的一半以上经商的事实，表明天津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了”。

由此看来，经过隋唐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海河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系统，不仅满足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漕运需要，而且使天津成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更使天津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得以脱胎换骨，逐渐成为北方繁华商埠和经济重镇。